



复杂劳动还原与经济循环的 内生增长动力

肖磊 胡俊超 鲁保林

摘要:自威廉·配第以降,关于复杂劳动还原问题形成了三种主要理论框架:总体劳动模型、市场过程模型和高价机器模型。马克思秉持市场过程思想,在劳动力的异质性和抽象劳动的同质性、有效市场、不同劳动类型剩余价值率相同的假定下论述了复杂劳动还原的市场过程,并以还原后的简单劳动为基础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复杂劳动还原是市场过程的结果。对复杂劳动还原进行思想实验表明:经济增长是社会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劳动升级对增强国内循环内生增长动力和可靠性发挥关键作用。在新时代,要通过制度完善和机制设计,提高社会总体劳动复杂性水平,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复杂劳动还原;市场过程模型;劳动复杂程度;国内大循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416

收稿日期:2023-04-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百年论争研究”(17CKS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磊,男,河南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E-mail: 42291150@qq.com;

胡俊超,男,山东临沂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鲁保林,男,河南潢川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①。2023年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②。马克思复杂劳动思想提供了理解和阐释这些重要论断和重大命题的理论指引。近年来,有学者将复杂劳动概念用于分析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③,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空间。本文据此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力异质性和劳动市场结构差异为基础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复杂劳动还原和价值内生增长的理论模型。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这一研究是基于对复杂劳动还原经验表现和实际过程的区分。实际上,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都曾经提出复杂劳动还原在市场过程上的含义,马克思将其表述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④。这意味着复杂劳动还原是通过竞争和市场运动表现出来的,是“市场过程”的结果。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我们可以依据经验中的可测量的实际经济变量来测量复杂劳动还原系数,而无须考虑市场过程。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5月6日,第1版。

③ 孟捷《复杂劳动还原与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世界经济》2017年第5期,第3-2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8页。

一 主要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分歧

在经济思想史上,较早提出复杂劳动还原思想的是威廉·配第。配第指出:“我们也必须使技术和简单劳动之间有一种等价和等式的关系。因为,假定我使用这种简单劳动,在1000天里能够耕耘播种100亩土地;再假定我用了100天的时间来研究一种更省事的方法,并制造出一种省事的工具;在这100天里完全没有耕耘土地,可是在其余的900天里我却耕耘了200亩土地;那么我认为,这种只花费了100天时间的发明技术就永远值一个人的劳动;因为有了这种技术时一个人所做的工作,等于没有这种技术时两个人所做的工作。”^①配第的论述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在相同时间内,包含了研发过程在内的劳动(复杂劳动)相当于两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还原系数为2。问题在于:当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工人利用新技术从事的直接劳动或直接操作可能更简单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复杂程度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呢?显然,配第没有用新技术之后的直接劳动来衡量劳动的复杂程度,而是将研发劳动包含在总劳动之中,依此计算相同时间内的劳动复杂程度。

配第的计算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劳动模型”。实际上,马克思在讨论生产劳动问题时也提出了“总体劳动”思想,但并没有用于解释复杂劳动还原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在工厂中打下手的辅助工人,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工程师又具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用自己的头脑劳动,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数量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力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所有这些劳动力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就像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自行增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②马克思的“总体劳动”思想意味着,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管理人员的劳动应当包含到“总体劳动”之中。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复杂劳动还原是指将研发或教育培训作为间接劳动包含在总劳动过程中的还原,还是指直接劳动过程复杂程度的增加?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显然,总体劳动模型的解释力更强,因为虽然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直接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趋势也同时增加了。

配第之后,亚当·斯密提出了复杂劳动还原的另外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与斯密所主张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有关,可称为“市场过程模型”。《国富论》中有这样的论述:“要确定两个不同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做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做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③市场过程模型认为,复杂劳动还原是市场过程自动实现的,这种实现是市场机制自发调整的结果。因而在有效市场上,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比例可以在经验中大致确定。这一重要思想在李嘉图那里进一步表现为相对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是商品的相对价值,即商品的表现价值;他还认为,“研究对于不同种类人类劳动的估价的高低,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这种比例的差别是历史地决定了的,变化很小,对短时间内商品的相对价值影响不大;他还指出,“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④。

马克思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思想,《资本论》第一卷提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简单劳动的不同

① A. E.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1页。

② 《资本论手稿选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7—418页。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页。

④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17页。

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①“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究竟是何含义?学界的看法见仁见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是一致的,均是指市场交换过程。在有效市场上,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会通过相互之间的议价实现大体上两不亏欠的交换。并且,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可以只考虑简单劳动,直接从经验中确定复杂劳动转换的比例。这可视为复杂劳动还原的本体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斯密的另外一种复杂劳动转换思想可称为“高价机器模型”。在《国富论》中,针对工资和利润随资本用途不同而不同时,斯密指出:“设置高价机器,必然期望这机器在磨毁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业可以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的利润。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②“高价机器模型”将学习成本视为投资,投资人要求能够收回所费成本并获取利润,其所表达的思想就是现代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投入,与马克思的概念不同,其价值论基础是要素价值论。按照要素价值论,不管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是创造价值的。陈其人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高价机器”模型的复杂劳动还原机制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第一,高价机器在使用时的折旧属于旧价值的转移;第二,高价机器的使用本身,就是这个载体上的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第三,复杂劳动也是要经常维护和练习的,这些成本也要归入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中来^③。这一解释将学习所获技能视为固定资本,它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是转移旧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活劳动不仅创造新价值,而且转移旧价值,即转移教育和训练成本。这种观点在国外的代表人物是希法亭,而且获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积极支持和发展。孟捷、冯金华认为,以置盐信雄为代表的学者,根据希法亭的观点建立了相应的数理模型,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教育和训练所花费的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总和等于劳动力在其一生中的劳动增加值,后者产生于教育和训练所带来的劳动复杂性提高,因此,教育和训练所消耗的劳动是通过劳动力一生的劳动过程转移的^④。这一思路的内含假定是:教育培训所形成的技能或研发的技术产品在以后的重复使用过程中能够一直创造价值,即威廉·配第说的“发明技术就永远值一个人的劳动”。在笔者看来,这一假定是不充分的,其原因在于:虽然教育培训所形成的技能在劳动力一生中能够使用多次,并且发明技术也能在社会中使用一定时间,直至被新技能新发明所取代,但是,在此过程中,一次性培训带来的技能和发明不可能在每一次生产中都创造价值,如果说第一次培训教育或研发可视为复杂劳动的话,那么第二个生产周期及其以后的劳动也就不再包含技能生产劳动和技术发明劳动了,也就是说,以后的劳动就变成简单劳动了。因此,“高价机器”模型存在理论上的逻辑不自洽问题。接下来,本文将基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扩展阐释马克思复杂劳动还原理论的假定条件,再从经验认识角度对“市场过程模型”作进一步的解释和发展。

二 基本假设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相关论述可归纳为三个命题:一是单位时间内复杂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二是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价值较高;三是复杂劳动的形成需要较高的培养训练费用。基于这三个命题,复杂劳动力价值、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及复杂劳动的形成费用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之比)等于复杂劳动力价值与简单劳动力价值之比,后者又取决于劳动力教育培训费用的不同。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富有深刻洞见,但命题的成立依赖于下述三个基本假定,若对于基本假定进行扩展,可以引申出更多经济学含义。

第一,马克思假定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和抽象劳动的同质性”。物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同质的,但是由于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不同,不同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能力存在差异。关于劳动力价值,马克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

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93页。

③陈其人《论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的机制》,《海派经济学》2004卷第11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④孟捷、冯金华《复杂劳动还原与产品的价值决定:理论和数理分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9页。

思将一般的教育训练费用计入普通劳动力维持再生产的生存工资之内,作为普通劳动力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①马克思的论述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不同,需要的教育费用也不相同;二是普通劳动力的教育费用,数额微乎其微,内含于其生存工资,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支出。

马克思的分析还揭示了决定劳动力价值的三个主要变量:一是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二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三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了分析的简便,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③,因而忽略了劳动力本身的差别。但是,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劳动力的发展费用和自然差别对劳动力价值具有重要影响,是不可忽略的。研究它们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领域重要的理论发展方向,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第二,马克思假定“市场是有效的”。在有效市场上,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存在障碍。此时,工资高低能够准确地反映劳动力的复杂程度,因而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工资之比可以作为复杂劳动的还原系数。这一假定不仅要求产品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状态,而且要求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也处于充分竞争状态。在这一严格假定条件下,若忽略劳动力个体天赋上的差异,那么选择什么层次的教育和培训,对不同劳动力而言是无差异的,因为人们会根据总体收益进行充分调整,教育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有效性保证了不同选择收益的均衡性。

另一种情形是,劳动者天赋才能的自然差别造成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专用才能差异造成的市场竞争不充分,超出了马克思的假定范围。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用复杂劳动力价值与简单劳动力价值之比计算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有较高天赋才能的劳动力能够“侵蚀”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下文的模型中,我们将设计一个包括特殊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如何从经验上计量劳动复杂程度。

第三,马克思还假定了两种类型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率相等”。实际上,这个假定也可以看作是第二个假定的推论,因为在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劳动力有完全的流动性,因而其剩余价值率必然是相同的。马克思在大多数场合都是先假定剩余价值相同,即存在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再分析更为本质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这些阻力会造成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例如为英国的农业短工而制定的定居法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④。

剩余价值率相等,是一种理想化。斯威齐指出,这个假定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个是“必须有一支同质的、可以转移的和流动的劳动力”;另一个就是“每个产业和每个产业内的一切企业,它所使用的劳动量必须刚好是现有条件下社会必要的劳动量”^⑤。关于这两个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已经明确地提出,即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纯粹形式的两个基本条件——假定不同质的劳动力可以化为相同的简单劳动力,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大体相同。

对于复杂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而言,“剩余价值率相等”也意味着不同质的劳动力价值直接对应着不同的价值创造能力,换句话说,两种类型的劳动力的价值之比等于它们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之比。因而在纯粹的形式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还原系数就完全等同于复杂劳动力与简单劳动力的价值之比。由此可以作出进一步推论:若马克思的三个基本假定条件满足,即便不同质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未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93页。

③ 郑志国《政治经济学的五个创新点》,《岭南学刊》2019年第6期,第101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95页。

⑤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4页。

一般的剩余价值率也未知,也可以通过直接观察不同性质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从而在经验上测算出复杂劳动的还原系数。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效市场上,我们只需知道不同性质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就可以在经验上判断出劳动的复杂程度,而不需要再去计量剩余价值率和价值总量。进一步地,如果剩余价值率相等,使用部门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之比来衡量复杂劳动还原系数,与上述用劳动力价值之比衡量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可能是等价的。

通过揭示马克思的三个基本假定所包含的经济学意义,实际上也就阐明了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社会过程模型”的具体含义:假如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市场过程将自动实现复杂劳动的还原。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忽略复杂劳动还原的具体过程,而直接认为整个社会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社会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分配,及其如何决定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大小。同样,对于复杂劳动的还原系数,只要市场是有效的,在经验上,我们只需观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就可以对其进行经验测算。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通过接受教育训练提升劳动复杂程度所获取的只是投入成本的利息收入,因此教育训练支出可视为一笔“生息资本”。对于没有经过专门教育训练的普通劳动力(如车间工人)来说,其基础教育费用归入生存工资,而专门的教育训练费用为零,人力价值等于普通工资收入的资本化。对于经过需要专门教育训练的高级劳动力(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说,其人力价值等于普通的人力价值加上工资溢价的资本化收益。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报酬可视为,工人从自己所创造的价值中获取了一部分相当于其人力价值的利息收入。

三 复杂劳动还原的市场过程

假定整个社会中的劳动力数量为 n , 根据不同种类劳动的知识要求将劳动力分为三种:一是普通劳动力(车间劳动力),他们只需要接受基础的教育训练,不同工种之间很容易转换,这种劳动力从事的劳动为简单劳动,假设其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为 θ_1 ;二是高级劳动力(技术劳动力),需要进行专业的教育培训,教育培训费用和学习的时间成本较高,形成的工作技能专用性较强,不同工种之间的转换存在壁垒,但是正常的劳动力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训练和学习都可以获得这样的工作技能,我们假设这种劳动力在总劳动中的占比为 θ_2 ;三是特殊劳动力,这种劳动力需要某种天赋,具有不可替代性,缺乏这种天赋的劳动力,即使经过教育培训或学习也无法获得相应的工作技能,也就是说,教育培训或干中学加上个人天赋才能具有相应专业技能。假设这种劳动力在总劳动中的占比为 θ_3 , 根据这些假设可知, $\theta_1 + \theta_2 + \theta_3 = 1$ 。

(一)完全竞争市场

假定以上三种劳动力的劳动在单位(一天、一周、一个月等)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分别为 λ_1 、 λ_2 和 λ_3 , 将高级劳动力和特殊劳动力视为复杂劳动力,并设定复杂劳动转化系数为 ϵ , 于是:

$$\frac{\lambda_2}{\lambda_1} = \frac{\lambda_3}{\lambda_1} = \epsilon \quad (1)$$

出于简化分析,这里将特殊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的转化系数设定相同,我们将特殊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和干中学成本视为同一的,特殊劳动力能够利用天赋能力分享资本家的部分剩余价值。高级劳动力由于不具备专业天赋,不能形成像特殊劳动力那样的技能,就不能分享剩余价值。高级劳动力虽然从事的也是复杂劳动,但是并不具备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权力,因为其他普通劳动力也能通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形成相应的专业技能并与之竞争。高级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的竞争性,意味着高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和干中学成本与其复杂劳动获取的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价值(工资)的折现值应该是一致的。设普通劳动力价值为 ω_1 , 高级劳动力的价值为 ω_2 , 特殊劳动力的价值为 ω_3 , 利率(或社会的一般收益率)水平为 r , 教育、训练和干中学的成本为 C , 假设劳动力获取工资的时间尺度为无限期限, 于是:

$$\frac{\omega_2 - \omega_1}{r} = C \quad (2)$$

假定高级劳动力与普通劳动力在劳动中具有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为 e), 根据(1)(2)两式可得:

$$\omega_1 = \left(\frac{r}{\epsilon - 1} \right) C \quad (3)$$

$$\omega_2 = \left(\frac{\epsilon r}{\epsilon - 1} \right) C \quad (4)$$

由式(3)(4)可知, 普通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的劳动力价值之比正好等于他们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比例。两类劳动力的劳动复杂性相差越大, 其工资差距也就越大, 这就说明在前面的假定条件下我们可以用不同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来测算劳动复杂程度。若假定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的成本 C 是劳动复杂程度 ϵ 的线性函数, 即 $C = (\epsilon - 1)K$, (3)(4)两式所表示的两种劳动力价值就仅仅取决于复杂劳动还原系数、利率和系数 K , 即:

$\omega_1 = Kr$; $\omega_2 = \epsilon Kr$ 。系数 K 实际上测算的是普通劳动力的人力价值, 即 $K_1 = K = \frac{\omega_1}{r}$, 其数值正好等于普通劳动力工资的资本化。进一步地, 高级劳动力的人力价值 $K_2 = \epsilon K_1$, 高级劳动力与普通劳动力的人力价值之比正好等于它们之间的复杂劳动还原系数。

再来看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的变化。根据定义, 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减去劳动力价值, 根据(1)至(4)式可得:

$$\lambda_2 - \omega_2 = \epsilon(\lambda_1 - \omega_1) \quad (5)$$

由式(5)可知, 资本家使用高级劳动力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与使用普通劳动力所获得剩余价值之比正好等于两类劳动的复杂程度之比。这表明, 在生产过程中, 随着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 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将同时提高。

(二) 不完全竞争市场

前已述及, 特殊劳动力的劳动复杂程度与高级劳动力是一样的, 不过, 他与资本家之间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若使用特殊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垄断势力, 产品按照价值售卖, 即劳动市场处于卖方垄断, 而产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那么, 特殊劳动力凭借其垄断势力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 从而导致剩余价值率降低。假设特殊劳动力的垄断力量为 η , η 也可以理解为特殊劳动力分享资本家由于使用复杂劳动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增殖的比例。剩余价值增殖的部分为 $[(\lambda_2 - \omega_2) - (\lambda_1 - \omega_1)]$, 于是, 特殊劳动力的收入可以表示为:

$$S_3 = \omega_2 + \eta[(\lambda_2 - \omega_2) - (\lambda_1 - \omega_1)] = \omega_2 + \eta(\epsilon - 1)(\lambda_2 - \omega_1) \quad (6)$$

式(6)中的 $[\eta(\epsilon - 1)(\lambda_2 - \omega_1)]$ 表示特殊劳动力凭借技能垄断而分享的部分剩余价值, 其劳动力价值仍然是 ω_2 , 即 $\omega_3 = \omega_2$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资本家雇用特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率较低, 但并不意味着利润率也较低, 因为决定利润率的变量还有资本有机构成。当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时, 使用特殊劳动力的企业因为利润率较低将会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 从而改变产品市场的结构, 形成产品市场垄断。这时, 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具有垄断势力, 借助于产品市场的垄断势力, 企业能获得一部分超额利润来弥补劳动市场的损失, 因而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率。

假设特殊劳动力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为 q , 产品的售卖价格为 p , 为简化分析, 我们假设生产不需要生产资料。于是, 特殊劳动力实际创造的价值为 $\epsilon\lambda_1$, 产品售卖所获得的“虚假的社会价值”为: $\Delta R = pq$

$-\epsilon\lambda_1$ 。其中的 ΔR 表示由于垄断租金而产生的超额利润。既然特殊劳动力有分享剩余价值的市场势力,那么也会同样具有分享超额利润的市场势力,考虑这一因素,其收入可记为:

$$S_3' = \omega_2 + \eta[(\epsilon - 1)(\lambda_2 - w_1)] + \eta(\Delta R) \quad (7)$$

式(7)中的 $\eta(\Delta R)$ 表示特殊劳动力获得的部分超额利润。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殊劳动力的劳动力价值远远低于其分享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其获得高收入的原因在于技能或天赋的垄断,而不在于其劳动的复杂程度。这些超额利润来源于普通和高级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特殊劳动力一方面侵占了其资本家的部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获取了其他类型劳动力创造的价值。

上述分析表明,接受基本教育的普通劳动力与经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的高级劳动力的收入差异的原因,在于后者在教育培训或干中学中进行了更多投入和支出。这些投入和支出包括在此期间放弃的劳动收入(机会成本)、教育培训费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以及维持劳动力的生活支出等,对于社会总体来讲这将是一笔巨额的花费。假定社会中的投入回报率或者说是自然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劳动力自由选择是否进行人力投资,竞争是完全和充分的,那么高级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必须使这笔巨额的投入获得按照自然利率计算的回报,这部分超出来的收入来源于复杂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创造出的更多的价值,同时使用高级劳动力的企业也获取了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一部分。所以,提高社会中的教育水平对于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有利的,市场过程的竞争效应将使得社会不断地提升劳动复杂程度。值得说明的是,进行教育培训或干中学需要劳动人口具有基本的知识获得能力和受教育水平,能够进入高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门槛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断提高的,要使得整个社会达到这种水平,就需要政府进行基础教育的投入,这种投入决定着普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如果没有这种投入或公共投入不足,那么就会出现社会劳动复杂程度提升的障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门槛效应就会阻碍人们在竞争过程中实现向上的劳动升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教育投入和知识水平,那么通过简单的技术模仿实现进口产业的替代都是不可能的。在市场过程中要获得劳动升级的内生能力,提升基础教育水平是关键,市场机制充分的竞争效应是必要条件,因而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是互补的。

特殊劳动力主要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例如科研劳动、管理劳动、创业劳动、艺术劳动等。这些劳动力除了要进行教育培训和干中学之外,还需要一定的天赋和个性能力。马克思讲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个性”,就是指人在创造性劳动中,劳动本身即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市场过程中,这种特殊劳动力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他们能够分享一部分企业的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马克思在分析农业地租时提出的虚假的社会价值思想,可以运用于分析这类劳动市场。以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创新为例,在产业创新过程中,创新产品具有垄断势力,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部分超额利润一部分将成为创新劳动的收入,一部分为企业获取。产业创新中的创新劳动,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发劳动、研发部门的管理劳动、企业家的组合劳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这些劳动力所获取的较高收入主要来自于对超额利润的分享。正是由于市场过程所具有的这种激励效应和竞争压力,使得市场具有促进创新创造的内生能力。提高劳动力的创造性和创新力,既需要发挥教育培训市场的作用,也需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创业投资的金融体系。从宏观上来讲,特殊劳动力特别是其中的创新劳动力的投入水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以及利润率和自然利率的高低,而自然利率又是影响高级劳动力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的投资收益率和回报率高低的核心变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基本原理。

四 经济循环的内生增长动力

对于复杂劳动还原的市场过程的分析,提供了增强经济循环内生增长动力的深刻洞见:经济增长表现为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从政治经济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的质量不断提高,复杂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前述假定条件下,高级劳动力和特殊劳动力都属于复杂劳动力,在相同时间内他们创造价值的能

相同的,其获取收入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特殊劳动力及其产品具有的垄断力量。整个社会的价值总量可以由这两类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总量由市场过程化为简单劳动。由于特殊劳动力分享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来自于所有劳动力创造的总价值量,根据(1)至(4)式可以计算单位时间创造的总价值量: $W = \lambda_1 \theta_1 n + \lambda_2 \theta_2 n + \lambda_3 \theta_3 n = [\theta_1 + \epsilon(\theta_2 + \theta_3)] \left[\frac{(1+e)r}{\epsilon-1} n \right] C$ 。假定普通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为1,即 $\lambda_1 = 1$,根据式(3)可得: $\lambda_1 = (1+e)w_1 = \left[\frac{(1+e)r}{\epsilon-1} \right] C = 1$,即简单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为1个单位,于是:

$$W = [\theta_1 + \epsilon(1 - \theta_1)]n \quad (8)$$

对式(8)进行处理,社会的价值增长率可以记为:

$$g = \dot{W} = \dot{n} + \left[\frac{\theta_1(1-\epsilon)}{\theta_1 + \epsilon(1-\theta_1)} \right] \dot{\theta}_1 + \left[\frac{\epsilon(1-\theta_1)}{\theta_1 + \epsilon(1-\theta_1)} \right] \dot{\epsilon} \quad (9)$$

式(9)表明,经济内循环的增长动力来源于劳动力增长率、复杂劳动程度增长率和普通劳动力比率下降率。首先,社会中的劳动力增长率直接决定着价值增长率的高低,如果劳动力增长率变化为1%,那么价值增长率同样地也会变化1%。这说明,人口红利、就业量变化、可用劳动力数量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内循环的内生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人口中可用劳动力的变动,而可用劳动力的变动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适龄劳动力占比)以及与经济周期波动关联的就业率。其次,社会中简单劳动力与复杂劳动力的结构是影响价值增长的重要因素,即劳动力的质量结构变动也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是大于1的,如果简单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增加,那么价值增长率就会下降,因此,提高社会中劳动力的质量,使复杂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也能够增强内循环的内生增长动力。增加社会中的教育培训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干中学的积极效能、构建学习型社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等,都是有效提升劳动力质量的重要途径,从而有利于增进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再次,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增长与价值增长是正相关的。这说明,提高社会中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价值内生增长的动力源。在劳动力数量变动大致稳定甚至下降的条件下,如果简单劳动力占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减少的结构性变化,那么不断提高社会中的劳动复杂性就是提升价值内生增长动力的唯一来源。提高社会中的劳动复杂性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劳动层次的提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演进,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科学劳动、管理劳动、艺术劳动、教育劳动等创新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将逐渐代替传统劳动、体力劳动、机械劳动等常规劳动形式,社会中的劳动复杂性将随着劳动形式的升级而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地,根据式(9),可以推导出劳动生产率的公式:

$$\dot{w} = \dot{W} - \dot{n} = \left[\frac{\theta_1(1-\epsilon)}{\theta_1 + \epsilon(1-\theta_1)} \right] \dot{\theta}_1 + \left[\frac{\epsilon(1-\theta_1)}{\theta_1 + \epsilon(1-\theta_1)} \right] \dot{\epsilon} \quad (10)$$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其核心思想概括为: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相对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①。其中,第一个方面的情况就是国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第二个因素就是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总价值量衡量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页。

的一国总的财富生产数量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两个部分,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包含劳动力质量和结构两大因素,即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表示为劳动复杂程度增长和复杂劳动占比增长的函数。劳动人口数量的变动,受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取决于自然因素和总需求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则取决于教育培训投入、创新研发投入、制度安排等供给侧方面的因素。

复杂劳动还原与价值增长模型,揭示了经济循环的内生增长机制。一方面,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和结构升级是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进行教育培训投入和干中学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劳动力结构和复杂劳动程度的函数。劳动升级是内生增长的关键动力,即提高复杂劳动的占比和复杂劳动程度是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增长动力。劳动升级意味着从体力劳动、非创造性劳动逐渐提升到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在世界产业演变中,发达国家通过占据高端劳动获取巨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从事组装加工的低端劳动因而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本质上是劳动升级、劳动力结构高级化。

前述模型是理想状态,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对模型的扩展是将基本假定逐步放开,形成更接近现实的结论。首先,劳动升级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在现实中,教育和培训不是完全市场行为。政府的公共教育和培训支出,企业部门免费提供的干中学机会,对于劳动升级尤其重要,甚至是基础条件。劳动市场也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存在市场分割、交易摩擦、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结果并非能够准确反映劳动复杂性水平。其次,由于劳动力存在流动障碍、技能专用性、谈判势力不同等因素,不同行业的剩余价值率并不相等,因而劳动力价值之比会偏离劳动创造的价值之比,从而使劳动报酬不能够有效反映劳动的复杂程度。最后,劳动力的复杂程度是相对的和变动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五 结语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等假定之上。根据这些假定,我们可以进一步用数理模型来分析复杂劳动还原的市场机制,并分析劳动复杂程度提升对于内循环的增长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方法不同于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高价机器模型”,避免了要素价值论的窠臼,能够将复杂劳动还原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①的基础之上,并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有效工具。我们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与“总体劳动模型”的思想是一致的:具有相同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或国家劳动报酬的差异,并不是由于直接劳动过程的复杂程度不同,而是由于不同区域或国家总体劳动水平的不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协同效应,劳动力价值差异所测量的劳动复杂程度反映了不同区域或国家总体劳动协同效应的不同,是综合性的经验指标。劳动复杂性不仅涉及到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与经济的内生增长密切相关。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内生增长理论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方法。

复杂劳动还原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复杂劳动还原思想属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政策含义在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通过制度完善和机制设计,提高整个社会的总体劳动复杂性水平,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平均劳动复杂程度显著提高,但行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并不强。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复杂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

第一,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和质量。基础教育是劳动力高级化和劳动升级的门槛,是复杂劳动占比提升和复杂劳动程度提高的必要条件。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升,各级教育普及水平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我国劳动力升级和产业升级提供了人力素质支撑。但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仍然是短板弱项,在农村人口规模巨大的条件下,提升教育水平和质量的任務还很艰巨。

第二,完善劳动力发展和劳动力流动市场机制。各级各类劳动力根据市场评价机制合理获取劳动报酬,使劳动复杂程度与劳动收入获取保持一致,劳动贡献反映劳动复杂程度,形成有效市场,更好激发劳动力高级化和劳动升级内生动力。当前,我国教育市场、培训市场、干中学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阻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例如劳动力流动障碍、市场分割、就业歧视、教育资本无序扩张等,需要进一步推进要素市

^①高林远《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论证方法和理论逻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34页。

场化改革。我国基础教育过度市场化也对教育市场形成严重干扰,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教育功能和选拔机制。

第三,完善创新劳动的产权保护和金融支撑。促进创新劳动是提升劳动复杂程度和复杂劳动占比的关键动力。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提供更加充分的创新资金支撑,促进各级各类创新劳动获取创新收益,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创造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第四,培育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型劳动力。随着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展开,劳动力的知识、技术、能力、组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在同一个技术经济范式下,简单劳动力与复杂劳动力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下,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劳动形态、就业方式、知识体系的深刻变化,必须着力推进各级各类劳动力的转型发展,以劳动力变革更好促进产业变革,以产业变革引领劳动力发展,实现二者的动态演进。

Complex Labor Reduction and the Endogenous Growth Dynamics of Economic Cycles

Xiao Lei¹, Hu Junchao¹, Lu Baol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7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Since William Gideon, thre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ave been formed on the reduction of complex labor: the total labor model, the market process model, and the high-priced machine model.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market process, Marx discussed the market process of complex labor reduction under the assumptions of heterogeneity of labor force and homogeneity of abstract labor, efficient market, and the same rate of surplus value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bor, and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the reduced simple labor. The reduction of complex labor is the result of the market process. Thought experiments on the reduction of complex labor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labor, and labor upgrading plays a key role in enhancing the dynamics and reliability of endogenous growth in the domestic cycl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labor complexity in socie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mechanism design, so as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plex labor reduction; market process models; labor complexity; domestic circula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钟秋波]